

一、中共政治局常委春節前後調研情形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 2020 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年，習近平、李克強、汪洋，分別赴雲南、四川及青海等深困區調研；胡春華、孫春蘭分別赴湖北、雲南調研，確保脫貧攻堅戰如期完成。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儼成中共執政首要要害，原關心的美中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內部經濟發展與脫貧攻堅，似無暇顧及。疫情對中共黨國體制及習政權合法性衝擊，值予續注。

（一）前言

2020 年是中共「十三五」計畫驗收年，也是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年。屆時，「精準脫貧」將成小康社會的標誌性工程，「貧困殲滅戰」要如期完成。春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鎖定「三區三州」的深度貧困區，輪番展開「脫貧」政策的調研工作。春節後，中共衛健委將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列為法定傳染病，染病與死亡人數攀升，疫情不再「可防可控」，一時之間成為影響中共政經情勢的黑天鵝事件。是此，專任疫情防控工作的組長李克強，頻頻在基層醫療院所與研發機構考察，成為春節後調研工作的治理軸心。以下茲分析春節前後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調研工作。

（二）精準脫貧政策執行成效調研

「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三大攻堅戰政策，「精準脫貧」名列其一。深度貧困區略稱為「三區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區，以及甘肅的臨夏州、四川的涼山州和雲南的怒江州，為脫貧政策重鎮，其中 8 成區域集中於青康藏高原區。然而，本年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終期限，中共高層在新年之際，就「扶貧」政策展開密集調研。

首先，中共政治局常委分赴四川、雲南與青海展開政策調研。2019 年 12 月 12 日起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四

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調研，該區為脫貧政策重點區域「三區三州」之一。汪強調，將確保所有民族都能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因此建立返貧監測預警和緊急救助機制，動態追蹤貧困人口、脫貧人口的情形。隨後，2020年1月19日，習近平在雲南騰沖考察，遠赴中寨司莫拉佤族村中了解工作進展。事實上，習在2015年初曾赴雲南考察，便宣告明確實施精準扶貧與脫貧政策，然而，雲南至今仍是中國大陸貧困人口和貧困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此外，1月21日起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青海西寧考察，聚焦於民生議題，走進黑城村漢族和藏族群眾家中，青海省的部分藏區亦為三區之一。

其次，中共國務院2位副總理調研「扶貧」工作。2019年12月23日起三日，孫春蘭在雲南調研，要求全面落實教育扶貧與健康扶貧政策，包含落實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就學政策、促進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等。24日至25日，胡春華則在湖北省恩施州調研，其為現任「國家脫貧攻堅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整年度先後赴江西、湖南、青海、陝西、西藏、甘肅等地的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考察，確保脫貧的攻堅戰能如期達成。

從政策成效面分析，據中共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指出，去年減貧人口1,000萬人，餘600萬人需要脫貧，共協助95%以上的貧困人口擺脫貧窮，讓90%以上的貧困縣從此除名。區域方面，西藏脫貧攻堅指揮部去年底表示，最後的19個縣區脫貧成功，大陸唯一完成所有縣區脫貧任務的省市級區域。

(三) 新冠肺炎防疫調研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自去年12月初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出現首例後，隨春運期間頻繁的人員流動，疫情漸次擴大，致多國撤僑、省市封城，疾病感染與致死人數急遽飆升。新冠肺炎的防疫治理，遂成今年初中共經濟社會的一隻黑天鵝，甚至恐誘發潛在政治效應。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疫情情勢險峻，已延後召開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在疫情治理工作方面，1月25日在習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受命出任「中央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任。該小組轄下設立「中央指導組」辦事機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擔任組長，中央指導組1月底進駐湖北。

疫情爆發之初，中共宣稱中央「可防可控」，使民眾掉以輕心。遲至1月20日中共衛健委發布公告，方將新冠肺炎正式定性，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明定按甲類預防管理。隔日，李克強便在青海西寧的紅十字醫院慰問醫護人員，並揭示疫情時值春運人流密集，在冬季病毒高發期的時間點上，積極建構集中專業力量救治患者、遏制疫情的醫護體系。27日，李克強親赴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慰問病人與醫護人員。

除慰問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外，李克強更關切疫情控制、疫苗與藥物研發進度，寄望能提高醫療效果、降低死亡率。李克強1月30日赴中國疾控中心，考察疫情防控技術的進展，並聽取衛健委的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的建議，決議統籌科研力量與儀器設備，協調研究與臨床的銜接，確保防控技術順利發展。2月1日赴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臺考察，確保醫用防護衣、口罩等重要醫療防控物資的生產供應，並交由中央統一調度。9日赴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考察疫情防控科技的前景，瞭解抗病毒藥物篩選過程與臨床試驗的情況，並慰問研發人員。

(四) 結語

「十三五」目標在即，精準脫貧政策面臨成效檢驗，去年底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更傳出習近平下令「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並展開脫貧「回頭看」工作。習近平、李克強與汪洋等高層赴基層調研，確保全面落實脫貧工作，以作為領導團隊的政治功績。然今年初傳染病治理的議題旋即而來，新冠肺炎驚動北京高層，身兼應對疫情工作小組長的李克強親赴慰問基層醫護人員，並督導防控科技與疫苗藥物的研發進度。現今，突發嚴重的疫情，儼然成為中共執政的首重要害。在疫情整治的全國性動員下，過去中共關心的議題，諸如經濟下滑、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爭議與扶貧攻堅戰，似無暇顧及。

疫情在近期處理之良窳，攸關中共黨國是否可繼續存續，習政權的合法性，值得後續關注。

二、中共對中東情勢的立場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中共近年對中東事務由旁觀轉而尋求介入，包括近期與伊朗、俄羅斯舉行三國海上聯合軍演、與該地區 13 個國家簽署不同層次戰略夥伴關係、透過中阿論壇等多邊平臺積極發展對話等。
- 中共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中東地區和平穩定有助「一帶一路」戰略落實；美國亦非無視中共在中東地區擴張，然其一旦陷入中東戰爭，恐提供中共 5 至 10 年發展期。

（一）新世紀以來中共對中東政策發展

中國大陸與中東地區距離遙遠，與以、阿雙方亦無直接利害關係，加上中東問題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暫非中共能力所能介入，結果讓其對此地區問題始終維持低調姿態。但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共對中東事務影響力明顯提升。尤其進入新世紀後，美國發動反控戰爭導致局勢再添變數，中共 2002 年 9 月任命史上首任中東問題特使王世杰，11 月赴中東進行斡旋工作，胡錦濤 2004 年提出發展「中阿新型夥伴關係」4 點原則，2006 年倡議「推動新世紀中阿友好合作關係」。

隨著阿拉伯國家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大原油供應來源和第七大貿易夥伴，習近平上臺後，中共 2016 年 1 月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共對中東地區首份政策綱領，其中提出以能源合作為主軸，以基礎建設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兩翼，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三大領域為突破口的「1+2+3」格局，並聲稱將在中東地區堅持「不尋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填補權力真空」等三不原則。大體言之，中共迄今雖努力迴避直接介入區域內國際紛爭，近年來作為有明顯強硬化趨勢，尤其係針對美俄態度對立的敘利亞問題；事實上，中共自 1971 年進入聯合國至 2019 年底，僅在安理會行使過 14 次否決權，惟自敘利亞內戰 2011 年爆發以來，先後 8 次否決針對敘利亞問題的決議案，都是與俄羅斯聯手；此外，2016 年 3 月宣布任命敘利亞問題特使謝曉岩，在中東和日內瓦穿梭外交，積極性日益可見。

(二) 川普主義下中東情勢之複雜化

2018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2015年由6國共同推動簽署的伊朗核協議，並再次對伊朗啟動經濟制裁，使中東地區在伊斯蘭國威脅、敘利亞與伊拉克內戰外，再添緊張焦點。其後，波斯灣2019年5、6月連續發生多起針對國際商船的襲擊事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油田9月遭無人機攻擊等，國際輿論指向伊朗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美國2020年1月空襲擊斃伊朗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im Soleimani)，一般認為此為近30年美國對伊朗施加最沉重的壓力。

或許為制衡美國在中東的積極擴張，中共繼2017年與伊朗在荷姆茲海峽首度聯合演習後，2020年1月與伊朗、俄羅斯舉行罕見的三國聯合海上軍演，伊朗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同時進行一年內第四度訪問北京之旅，與王毅共同抨擊美國「單邊主義與霸權行為」。另在美國發動前述空襲斬首行動的同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話，重申美方不希望局勢升級的基本立場，後者則呼籲各方克制。如同許多分析家指出，儘管中共反對美國過度擴張，惟亦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原因是其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亟需一個和平穩定的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朗位處溝通中東與亞洲「一帶一路」沿線的關鍵國家。

(三) 中共對中東政策之前景分析

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2019年6月發佈「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角色變化」研究報告(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指出，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後，中東地區對中共的利益愈發重要，中共對中東的影響亦與日俱增，如2015至2019年間，中共與該地區13個國家簽署層次各異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5個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此外，透過「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CASCF)以及「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戰略對話」(China-GCC Strategic Dialogue)等多邊平臺，積極發展對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中東地區的政治遺產近乎零，使其能與地區內一些傳統的「敵對組合」同時建立聯繫，

例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阿聯酋和卡達等，倘若美國進一步陷入中東泥淖，未來發展或對中共有利，如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研究員卡普蘭（Robert Kaplan）指出，美國在中東的對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共。

嚴格來說，美國並非無視中共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擴張，例如2017年4月中美首度雙邊峰會期間，川普突然下令飛彈攻擊敘利亞化武庫，並選擇在餐桌上「知會」習近平與中方，象徵意味不言可喻。儘管如此，就在美國持續從傳統地緣政治角度思考並推動其中東戰略時，中方亦透過「帶路倡議」新思維擴大參與該地區貿易活動與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伊朗顯然是發展重點之一，成為中共與中亞地區互動之關鍵結點。至於美伊關係無論惡化背景為何，都可能將德黑蘭推向北京一方。更甚者，一旦美國不小心落入中東戰爭陷阱，勢將無法兼顧旨在制衡中共的「印太戰略」，從而讓後者意外獲得5至10年發展機遇。當然，2020年1月下旬突如其來的新型肺炎（COVID-19）為中國與全球帶來一個新變數，它將如何影響既有中東區域情勢，需要後續密切觀察。

三、中共航太科技發展

國防大學戰略所所長沈明室主稿

- 中共 2020 年長征五號發射火星探測器，2017 年嫦娥五號探測器至月球採集岩石樣本；2022 年打造太空站，作為前進太陽系其他星球的中繼站。
- 中共今年或成首個探測火星的國家，長征五號雖於 2019 年底終發射成功，惟其發動機噸數遠小於他國，執行火星勘查任務仍存變數。
- 中共發展航太科技目的，一是掌握星球重要礦產及太空作戰部署，與美爭太空邊疆主導權；二是建成航太強國；三是提升航太產業經濟規模與利益。美成立太空科技部隊，成中共航天發展變數。

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後，受到經濟發展助益，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戰略影響擴及全球，在高科技如國防及航太領域積極迎頭趕上美國，與美國並駕齊驅。尤其 21 世紀後，大陸科技領域的發展蓬勃發展。例如，軍事科技方面，中共發展反艦彈道飛彈及各式中程飛彈，透過反介入戰略，對美國介入印太區域造成壓力，使美國重新發展中程飛彈。在航太方面，如長程火箭研發，建立衛星發射的太空產業、自主的北斗衛星體系，避免美國及西方國家在全球定位系統的宰制。

中共視航太發展為科技強國的重要指標，投入大量預算，將過去「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月球探測視為航天發展的代表成就。惟由 2019 年底中共第三度發射長征五號火箭才成功的例子來看，航太科技發展仍有其限制。當中共積極竄起成為航太強國之際，美國重新檢視太空科技發展，投入國家資源以確保太空優勢。

（一）航天科技發展藍圖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共配合 5 年經濟發展計劃，每隔 5 年公布航太科技發展的藍圖-「中國的航天白皮書」，闡述發展願景與未來的任務。根據最近一期「2016 中國的航天」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

中共提出「航太強國」的願景，期望 2030 年成為前三大航太強國。5 年內須達成任務，包括啟動重型運載火箭工程，建立衛星遙感、衛星通信廣播、衛星導航定位三大系統，建設太空與地面一體化的資訊網絡，建立太空基礎設施體系，促進衛星及應用產業發展。另外也要推動一體（太空科技）、兩翼（太空科學、空間應用）全面發展等。

在具體作為方面，白皮書指出要發展新一代運載火箭、衛星發展 2018 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及周邊國家提供基本服務；2020 年前後，完成 35 顆衛星發射組網，為全球用戶提供服務。在深空探測方面，2017 年底完成發射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及採樣返回。2018 年發射嫦娥四號月球探測器，首次於月球黑暗面登陸，建立地球與月亮的中繼通信。2020 年發射首顆火星探測器，實施環繞和巡視聯合探測。上述所提任務時間表大致已完成，受到注目的是今年中共必須發射首顆火星探測器，成為中國航太發展的指標。

中共 2016 年正式啟動火星探測工程，2019 年完成著陸器懸停試驗，預計今年以長征五號火箭搭載探測器前往火星，推估飛行 7 個月抵達，在火星降落 7 分鐘。如果能夠完成，將成為首個探測火星的國家。另在探月計畫方面，中共成功發射地球與月球間的中繼衛星，2019 年以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降落月球背面，成為各國先驅。2020 年將運送嫦娥五號探測器到月球，採集月球岩石樣本回來。此外，2022 年將打造自己的太空站，作為前進太陽系其他星球的中繼站。這些任務如果進行順利，將可在今年完成，作為中共建黨百年的獻禮。

（二）意圖

1. 爭取太空新邊疆主導權

地緣戰略觀點因為科技發展延伸至太空，航空與太空已連結，形成「空天一體」作戰的概念。意即誰能掌握太空，就能掌握空中及地面作戰的主動權。太空新邊疆的主導，不再是靠傳統衛星通訊、中繼與監偵的能力，而是從太空平臺發射武器，或佔領太空重要領土，掌握星球重要礦產及太空作戰部署。太空能力運用，表面上是商業或民間用途，但與軍事科技發展息息相關。例如，長程火箭與洲際彈道飛彈發展連結、火箭攜帶衛星與飛彈攜帶核彈頭作用原理類似、衛星氣

象通訊等民間用途可成為軍事監偵利器、太空站與衛星武器化後，太空重要戰略武器平臺。中共解放軍要與美軍抗衡，航太空間的作戰平臺非常重要，未來與美國競爭也會延伸到太空領域，中共必須急起直追，在太空新邊疆取得主導權。

2. 建立航太強國形象

正如白皮書所言，中共希望 2030 年成為三大航太強國之一，符合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正當中共資訊、航母科技落後於美國，並苦苦追趕之際，正好美國航太科技發展呈現停滯的現象。中共每年投入 80 億美元發展航太科技，符合其「彎道超車」的科技發展慣性。2018 年發射太空站實驗核心艙，預計 2022 年正式完成「天宮號」太空站。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多國合建的國際太空站 2024 年退役，屆時天宮號或將取而代之，成為地球唯一尚在太空運行的工作站。中共一系列太空探索計劃，使其成為國際太空領域的強國，並享有更大的話語權。

3. 追求航太產業利益

中共航太發展起初為國防軍事用途，由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太空作戰部門負責，爾後逐步擴大至民用太空產業，由國務院工信部負責，大陸航太兼顧軍事與民用科技的發展。中共長征系列火箭發展完成後，幫助其他國家發射衛星成為其太空產業主要商業利益。其中大部分太空科技和能力，由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CASC）和中國航太科技工業集團公司（CASIC）下屬的研究所開發。OneSpace 等中國民營航太企業，亦與 CASC 或 CASIC 有關。透過這些公司的運作，一方面可與美、俄及歐洲進行太空合作，亦可透過民用公司延攬發射衛星或是火箭科技移轉等業務，建立陸航太產業的規模，奠定提升發展太空科技的經濟與利益。

（三）航天科技發展的瓶頸

白皮書提出發展新一代的運載火箭，除長征五號外，要發展完成 120 噸級發動機，並運用在長征六號、七號新型運載火箭的首飛，以及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中共航空機構耗費 10 年研製長征五號火箭，號稱綜合性能與美國三角洲四型、俄羅斯安加拉火箭

相近，2016、2017 年攜帶衛星發射失敗，且是發動機發射失效，導致彈體及衛星墜落太平洋。2019 年雖發射成功，證明中共對長程火箭發動機的研發製造仍有瓶頸。

據德媒報導，中共火箭發射技術尚未成熟，落後美國、俄國和歐洲約 10 年。長征五號使用發動機來自 1990 年代仿製蘇聯 RD-120 發動機，推力僅 50 噸，遠不及俄最新發動機 420 噸、美發動機 189 噸，甚至日本發動機 110 噸。以長征五號為基礎發展的長征六號、長征七號，雖然號稱試射成功，惟在仍未攜帶衛星正式航行前，仍難定論。如以長征五號火箭攜帶火星探測器升空，除探測測繞月火星、落地、升空等問題外，火箭升空至適當軌道位置，投射後持續精準飛行至火星，都是很大的考驗。中共必須在今年完成發射，才可能在 2021 建黨百年之際，完成登陸火星之旅。

和其他國防科技類似，中共火箭發動機是以「逆向工程」方式，仿製前蘇聯的火箭發動機，彈發動機科技研發不僅在拆解、複製及組裝，重點在系統設計構想、製造與整合過程，以及內在的機密資訊或經驗數據。單純複製的結果將降低成品系統的功能與可靠性，以此成品再進行性能提升，很難有突破性進展。中共長征五號火箭、以蘇愷 27 戰鬥機為本研發的殲 11 戰機的延伸機型等，都有類似問題。中共歷經三次才成功發射長征五號火箭，未來探月及火星探測又需以此型火箭投送，變數不可小覷。

(四) 結語

2018 年 2 月，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原副院長梁小虹在公開演講中直言，中共航天發射面臨火箭衛星成本高、發射周期長、人員力量不足、質量控制不穩定等問題，剛好是針對 2016、2017 年火箭發射失敗的最佳反省。2019 年底發射長征五號雖然成功，亦有媒體稱長征五號火箭達世界水準，並不代表上述問題已解決。此型火箭能否承擔未來發射重任，仍待觀察。

中共企圖建立太空站、月球基地、火星探測等計畫即將在今年實現，引起美國的關切。美國除宣布成立太空部隊外，也投入大幅預算重新發展太空科技。例如，2019 年 5 月美國要求國會增加額外 16 億

美元，作為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2024年重登月球的首期預算。另亦計畫在月球軌道建立太空站、登陸月球南極，下一步向火星發展，計畫藍圖與中共類似，競爭意圖明確。美國的計畫起步雖比中國晚，若投入大量預算，結合美國先進科技，可能在月球基地及火星探測上後發先至。這也是中共航太發展中，除本身科技能力因素之外的國際競爭變數。

四、中共整治農民工欠薪問題觀察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莊奕琦主稿

- 陸農民工欠薪問題頻發於建築業，近來零售、服務等小微企業案件有增多趨勢，其中欠薪最多的屬國營企業。
- 中共國務院成立領導小組，李克強為農民工追討欠薪，惟多止於作秀；地方政府因個人利益或 GDP 成長率，無意解決。
- 中共為 2020 年徹底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加速推出整治措施，然市場秩序未規範、管理制度不完善、勞動監察和司法保障與執行不週等結構原因，促使農民工薪資追討不易與效果有限。

(一)前言

中國大陸農民工欠薪問題存在已久，尤其大陸經濟在 2015 年以來陷入新常態，在經濟不景氣下，欠薪事件頻繁發生。據報載，2017 年中共辦理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44 萬多件，農民工受援達 49 萬多人次，成功討回薪資共約 83 億多元。2016 年國務院辦公廳曾提出「關於片面治理拖欠農人工人為問題的定見」，目標到 2020 年要建構完善的治理方式，使拖欠農人工人薪資問題得到徹底解決。2019 年 12 月 4 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次強調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發放的問題。12 月 23 日李克強在成都建築工地視察並喊話，拖欠農民工工資是「昧良心行為」，必須堅決根治。數日後，中共最高法院發行「關於進一步加強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法院落實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審判執行工作，稱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宣稱要建立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長效機制。顯然長年來農民工欠薪問題並未獲得妥善治理，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儼然已成中共當局維穩工作的重要項目。

大陸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核心在中共體制。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指出，「第一，中國人沒有基本的人權保障，第二，中央和地方唱雙簧。」國務院 2013 年 6 月成立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2019 年 8 月成立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保障農民工的利益，李克強、前任總理溫家寶亦分別於 2017、2003 年為農民工討薪，但通常多只

是作秀，並無太大作為。當地政府則出於個人利益或追求所謂 GDP 成長目標，根本對農民工棄之不顧。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經常成為被欺詐和被愚弄的對象。前山東維權律師祝聖武亦表示，積欠農民工薪資最多的是國營企業，法院根本審判不了也執行不了。實際上，農民工討薪的成本非常高，亦經常被行政部門刁難，而真正幫農民工討薪的公益機構不是被關閉，就是機構人員被抓。如中鐵建等大國企，對付討薪的辦法是直接派黑社會把農民打散，不允許媒體報導，亦不准法庭立案。2019 年三位勞工自媒體「新生代」編輯被捕，目前仍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無法與家人或法律代表聯絡。該媒體致力於「推動經濟民主，維護勞動價值，建設公義社會」為勞工爭取權益為訴求。基這些原因，中共最高法院此次的「通知」，其效力再次受到多方的質疑。

(二)欠薪問題頻發於建築業，小微企業近成注目焦點

對中國大陸多數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就是能否按時發工資。2019 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 1,386 起工人抗議，其中 1,159 起（約佔 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最為嚴重，佔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 43%。建築行業的工人抗議案件，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 99%。工程項目層層轉包轉嫁是一項重要原因，建築行業積弊已久的包工模式，大包工頭賺施工差價，小包工頭賺人工費差價。這種層層的轉包制度增加工資給付的風險，一旦工程款前端環節出現違約損失，施工方便以扣減工資方式彌補虧空，最終受害的是從事實際施工的農民工。另一方面，工程支付工資的行規，常常每個月發一點生涯費，盈餘部份累計至年終或工程完畢才結算，故通常年終始支付應得的工資。這就是為什麼欠薪事件總在歲末頻繁發生。

中共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的建築工人被系統性的剝奪基本勞工權利(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簽訂勞動合同、與參加社會保險)，面臨被拖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足等問題。2019 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觀察報告」建議建立企業工會和行業工會的集體談判制度，通過工會建立發展公平的一次分配制度，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近年來，中國小微企業欠薪情況也成注目焦點，在餐飲服務、加工製造、家政服務等領域的小微企業零散欠薪問題頻傳，小微企業發生欠薪後，業主迅速歇業或逃走失聯，小微企業因進出行業的門檻低，倒閉風險高，同時增加工資追討與執法的困難度。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後工業化時期，國內需求增加，服務業日趨繁榮，隨之相關服務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相對下降。從 2014 年至 2019 年，工廠工人的集體行動從 2014 年佔總數 41% 的高峰一路下滑至 14%，而服務、零售行業工人抗爭則從 2014 年的 9.7% 上升到 2019 年的 23%。服務業工人集體抗議所佔比例則迅速增加，從 13% 一躍升至 18%。服務及零售業從業者通常為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業風險也更高。

就所有權來看，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過國有企業及外資企業。2019 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佔 79%。其主要原因為國有企業為降低勞動成本逐漸減少聘用正式僱員，而使用更多外包私營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國企具高度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更困難。尤其近年來，因為黨組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使得抗爭的本質變為對執政黨的反抗，使抗議更容易被壓制。而外資企業較遵守國際勞動規範，工資待遇和保障也較好，故工人抗爭事件相對也較少。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產業的負面影響，發生在廣東省內的抗爭數量佔全年總數的 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抗議更佔全境製造業抗議的 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爭事件中不少都和工廠關閉及搬遷的欠薪有關。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在戶口制度的雙元勞動體系下，農民工是經常遭受市場歧視的一群勞工，包括低工資的剝削，醫療保健與小孩教育的缺乏，勞動法規的保障不足等，相關的積欠工資也成為主要的受害項目，求救無門下農民工只能靠自力救濟。河南隆盛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農業企業，從 2017 年年底開始拖欠工資達 58 萬元，公司的實際經營人逃匿無蹤。2018 年 12 月 19 日，山西呂梁市臨縣洋洋房產 60 名農民工到縣政府討薪遭警察鎮壓，多人被毆打，十餘人被抓

捕。2019年12月15日雲南省曲靖市的一個建築工地拖欠農民工工資，數十名工人在街上拉橫幅遊行，抗議黑心老闆不給工錢。這些許多是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

(三)中共政令執行成效不彰；農民工市民化為首務

中國政府為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研究出台一些政策，包括雇工採實名制、繳交工資保管金、建立欠薪戶黑名單、追討的工資加計延滯利息和罰緩等。中國大陸甚至還有所謂的欠薪罪（正式名稱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6條之1規定，「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後果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但執行面卻是選擇性執法，造成效力不彰。前述最高法院「通知」的落實遭到各方質疑的主因亦即在此。普遍認為零星的或小的案件會被處理，但對於有特權的國企或大企業另當別論。

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根源在於市場秩序未規範、管理制度不完善、勞動監察和司法保障與執行不週等結構性原因，造成許多農民工工資支付的責任主體難以釐清，追討不易與效果有限。這是中共的體制問題，人權未受到基本的保障，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封鎖與對感染而往生者的不尊重處理方式即是一例。故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治本之道，首先是農民工市民化勢在必行，勞工不應依戶籍被區分為不同的勞工、給予不同的工資待遇，從所有勞工的權益應一視同仁做起。徒法不足以自行，自由與透明的體制改革才能畢其功於一役。

勞動應得報酬的保障不僅是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勞動所得更是維持家計生活的重要所得來源與推升國內需求的驅動力。無論從國家發展、產業發展、社會發展乃至家庭與個人發展來看，勞動工資的保障應該列為發展的優先項目，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更與脫貧直接相關，解決農民工欠薪的問題，恐非中共虛應故事作法足以應付。

五、中共對我大選後兩岸關係發展之看法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季廷主稿

- 中共評估蔡總統勝選原因，一為東亞地緣政治競爭；二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助力；三為國民黨老化與分裂。
- 中共關注蔡總統 520 談話會否將「中華民國臺灣」概念具體化，面臨臺政局不確定情形下，採保守的「底線思維」。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可能導致中美科技提早脫鉤，或將延緩「一國兩制」改革；武漢包機事件亦可看出中共、執政當局及國民黨三者缺乏信任。

(一) 前言

2020 年 1 月 11 日蔡英文總統以壓倒性的 817 萬票獲連任後，各方對於中共如何評估選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大多認為蔡總統在 520 的就職演說，將會是觀察的重點。本短文的目的是，是從中共可能評估蔡總統此次的三個勝選因素，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由於目前各項戰略情勢與 2016 年蔡總統勝選已經大不相同，中共或重估是否繼續維持 2016 年 520 後的「聽其言，觀其行」立場，且如何將「中華民國臺灣」的概念予以具體化，將會是 520 演說後，對臺觀察重點。

(二) 中共評估蔡總統勝選因素

中共認為此次蔡總統勝選連任的原因，至少可以歸納為三個。第一，東亞地緣政治的競爭。從川普上任後，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友臺法案、美軍在臺周遭的海空巡航、國防部及國務院先後公佈印太戰略報告的內容，中共認為是川普在地緣戰略競爭下所打出的「臺灣牌」內容。中共官方媒體或學者，在選後的評論多提及，臺灣「挾洋自重」是蔡總統勝選的因素之一，美中戰略競爭對臺選舉產生影響。

第二、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助力。從 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有關「一國兩制」的談話後，臺灣選民普遍地認為中共堅持的「九二共識」，已明顯地與「一國兩制」內容加以連結。隨著後來香港在 6 月因「逃犯條例」的修正，釀成大規模「反送中」運動，明顯觸動臺

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反感。因此，「人民日報」曾經在「正告臺當局，收回涉港黑手！」一文中提及，蔡總統、民進黨和美國透過介入香港「反送中」運動，獲得影響選舉之利益。意即中共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也是蔡總統連任的另一要素。

第三，國民黨的老化與分裂。國民黨敗選後，臺灣選民普遍認為是國民黨候選人主張的「九二共識」或整體的中國大陸政策所致。惟中共學者則認為，國民黨 2018 年就是因為「九二共識」勝選，所以此次敗選不能歸因到「九二共識」內容。與此相關者，中共認為國民黨政治菁英老化，失去主動引導年輕選民的能力，才是其無法獲得持續認同的因素，並造成「九二共識」在臺污名化。另外，中共學者認為，國民黨另一敗選原因，在於國民黨部分的「知識藍」與「經濟藍」分裂，不願投票給韓國瑜而造成選票不如預期。

（三）2020 選舉後中共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評估

從前述歸納中共可能評估蔡總統勝選的因素，發現蔡的勝選歸結於外部矛盾（大國競爭與亡國感）大於內部矛盾（兩黨競爭）。因此，中共如何看待選後的兩岸關係發展，也就繫之於上述三個因素的後續發展。

首先，有關臺、美關係發展，中共應認為蔡總統在無連任壓力下，將呈現更為「親美抗中」的趨勢。國內外解讀蔡總統 817 萬票所釋出的訊息，亦為臺灣要持續強化與美國的關係。雖然現階段美中 1 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惟中共很清楚地認知，川普在接下來將近一年的選舉期間，還是會維持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展現對中共的強硬姿態，以免遭民主黨對手譏為立場軟弱。貿易戰開始之初，許多專家提及美主要目的是經貿與科技脫鉤，同時希望中共針對補貼問題提出結構性改革措施。因此，中共對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合理地預期臺灣將在特別是科技脫鉤，扮演重要的助力。不過，川普總統 2 月於 Twitter 公開表示，反對美國政府內部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美科技公司出售技術給華為公司。外界對此解讀為仍希望增進美就業與貿易為主軸。因此，對中共來說，臺灣是否會出現更進一步的「親美抗中」，部分將繫於美國選舉期間，川普是否會因競選對手的反譏，而撕毀第

一階段協議或涉及華為公司的相關決定。畢竟，美國不論是政黨或政府國安團隊，仍以主張對中強硬為主。

其次，有關習近平在 2019 年初「告臺灣同胞書」40 週年的「一國兩制」談話與其後發生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應會加速中共未來提出較具體的香港「一國兩制」改革方案。從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區議會選舉泛民派大勝，到蔡總統的連任，一般咸認是對「一國兩制」的否定，亦不期待民主與放權的「兩制」得以實現。對中共來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會發生問題，是因為過於強調「兩制」，因此，「一國兩制」將朝向更為中央集權的「一國」加以改革。當然，對中共來說，朝向「一國」的改革，可能會影響到國際（尤其是美國）對香港的特殊定位。惟中共很早就將「反送中」運動定性為外國勢力干涉，否則不可能有資金進行高程度的組織動員，所以勢必要強化對香港的控制。未來陸港融合的改革對兩岸關係發展將有深遠的意涵。

臺灣與其他國家對香港的特殊定位，是源自香港保有一定程度自主性，並成為臺灣與中共的另一種連結場域。一旦這種特殊性喪失，兩岸透過香港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連結亦將削弱。當然，中共必然知道這種對兩岸關係的潛在負面效果，但從美、中對抗的戰略格局來說，中共必須拿回更多對香港的控制權。對中共而言，臺灣在這場博弈的大格局與香港問題上扮演著相當程度的角色，那麼臺港社會連結就是對中共政權的一種威脅。況且，即使沒有類似的改革，不等於兩岸關係就會有正面發展。因此，中共可能會試圖平衡在維持香港經濟特殊性，與緊縮香港朝向「一國」的治理層面有所改革。本來，香港「一國兩制」是中共為吸引臺灣人心的重要模範制度。惟在港所謂的「兩制」，是指資本主義制度，而非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共可能假設只要透過陸港經濟融合，提供港年輕世代足夠的住房與工作保障，依然可以對臺灣產生向心力，抵銷對香港拿回更多控制權的副作用。

最後，中共與國民黨將進入低檔互信關係的盤整期，中共對臺或將採取保守的「底線思維」政策應對。從 2016 年的政黨輪替後，中共先後推出對國民黨執政縣市的農業採購與對臺 31 項措施，看到 2018 年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提出「九二共識」與其後國民黨地方選舉的勝選，中共因而認為相關對臺措施是有助國民黨維持「九二共

識」論述與勝選的政策工具。因此，中共 2019 年再次提出對臺 26 項措施，希冀可以在 2020 年的總統大選再次發揮作用。然此次選舉不僅國民黨未對「九二共識」多所著墨，且從國民黨選後的權力重組來看，其各年齡層的政治菁英均出現檢討「九二共識」、三通或甚至「一中原則」的論述，中共亦利用外宣管道提出嚴厲的批判。中共未來不論是國民黨新興勢力的中國大陸政策論述方向、相關單邊措施對國民黨在臺選舉影響、與國民黨本身的政黨健全性，可能均列入國共關係的檢討範疇。簡言之，國共從 2005 年「連胡會」後所建立的互信關係，可能在短期內會進入相對低檔的觀察期。於此之際，中共與民眾黨基於「兩岸一家親」的互動，以及民眾黨本身在臺政治結構的發展，短期內亦仍處於不確定的觀察期。中共面對這種多重不確定資訊的狀態下，可能會採取較為保守的「底線思維」政策，應對臺灣國內政局發展。因此，中共對國民黨黨主席補選人選的批判、共機近 2 個月，曾 24 小時兩度繞臺與飛越臺海中線，都可說是在這種不確定狀態下的「底線思維」行為。

以上主要是從中共可能評估蔡總統勝選的三個主要因素，折射出對未來兩岸關係偏向悲觀的看法。近期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亦可能進一步影響中共對上述三項涉及兩岸關係發展因素的評估。第一，中共大量資源已使用於肺炎治療，因而有美媒指出，中共可能要求與美重新磋商並彈性處理貿易協議。但如美國不願就此放手且中共亦無法進一步履行的狀況下，應可預期美中之間的科技脫鉤有期程提前的可能性。第二，由於疫情將使中共今年的經濟發展來到近年低點，香港的特殊地位將是維持中共經濟發展的重要來源。因此，香港「一國兩制」改革政策或許需要推遲或採取比較緩和的政策。第三，此次對滯留武漢的臺灣人回臺一事，中共不論是與執政黨間的言詞齟齬，或國民黨事後與徐正文的切割等，可看出三方低度互信依舊。此外，中共官員之前對疫情的隱匿，造成人民對政權的不滿輿論，也將使中共維持對臺採取上述「底線思維」行為，以避免民族主義的反噬。

（四）結語：重估 2016 年以來的「聽其言，觀其行」

2016 年蔡總統 520 就職談話後，中共曾以「未完成的答卷」回應，

並表示將對蔡總統保持「聽其言，觀其行」。對中共來說，這張答卷迄今尚未完成，蔡總統今年 520 的就職談話將是中共重估「聽其言、觀其行」立場的重點。其中有關領土問題的表述仍為評估重點。惟基於一國對外政策不會有大幅轉變的基本假設下，中共可能更關注於蔡總統如何更進一步將「中華民國台灣」的概念予以具體化，將會是 520 演說後真正的觀察重點。因此，中共在蔡總統的第二任期以後，是否還要繼續維持 2016 年「聽其言，觀其行」立場，正處於重估階段。